CHINA'S ECONOMIC REFORM PROCESS

中國經濟改革進程

吳敬璉 著



自序

從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算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 40 年的路程。改革開放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中國能夠在 2010 年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本書力 圖對改革開放以來波濤起伏的歷史進程作一簡要的述評。

在我看來,推動中國經濟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場的擴展 使個人和企業的選擇權得到了一定的發揮空間。雖然還有不少限 制,無論是企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和銷售定價行為,還是個人對勞 動的提供以及對商品服務的消費選擇,與改革開放前相比,人們 有了當初無法想像的自由選擇權。這種建立在市場基礎之上的自 由選擇權的擴大,為勞動、資本與技術在特定時間與空間的有效 組合創造了便利條件,從而極大地釋放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

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可以歸結為市場在地域與範圍上不斷擴展的過程。然而,在計劃經濟的歷史背景下,市場的出現及其擴展並非是一帆風順地直線進行的過程。那種將中國改革開放看成是基於帕累托優化的經濟理性而做出的政策選擇的看法,充其量是對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一個過度簡略的描述。它沒有解釋是甚麼導致了中國在計劃經濟的沉重歷史包袱下小心翼翼地重啟市場;也不能說明為甚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經歷了那麼多的曲折和反覆,以及改革開放自身不時面臨停滯甚至倒退風險。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傳統的工業化路線已經破產、社會瀕於潰敗的歷史背景下,作為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模式的一種替代選擇,迫不得已地提出和實施的。其早期強烈的試探和摸索性質,使得市場首先在國家控制不那麼嚴密的一些領域(如農業或城鎮一般服務業)或者相對隔離的特定區域(如沿海經濟特區)最先被引入。而作為傳統計劃經濟主體的國有經濟部門,其早期改革思路則深受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人們寄望於在保持蘇聯式社會經濟體制基本框架不變的條件下通過部分引入市場價格信號和激勵機制,達到提高經濟效率的目的。其結果則是在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失控」和國家加強對企業管控之間搖擺。這種情況清楚地表明,中國的早期改革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市場化目標,而是通過一些混雜着實用主義色彩的變通性的經濟措施,試圖擺脫僵化的命令經濟以及「強勢國家無所不能」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困境。

改革開放指導思想中的實用主義做法是一把雙刃劍,對中國 經濟改革的路徑和長期績效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中國用 「摸着石頭過河」的方式繞過障礙,走出了一條以「增量改革」為 表徵的經濟發展道路,在一般商品和服務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從而加強了中國向市場化、法治化縱深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 由於缺乏對命令經濟弊病根源的徹底反思和廣泛共識,一種脫胎 於命令經濟思維、強調國家對經濟實現高強度控制的統制經濟模 式在理論層面獲得了或明或暗的支持,並往往利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遭遇的暫時性困難或出現的問題,如社會貧富分化和腐敗現 象,使國家權力對企業和市場的管控在實踐層面不時過度擴張, 給市場化、法治化改革帶來了巨大阻力。尤其是在 21 世紀初期, 面對日益複雜的經濟和社會形勢,不僅在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 的改革上停滯不前,而且在一些工業企業領域出現了「國進民退」 的情況。

然而正如古話所說,「福兮禍所倚」。改革停滯所造成的種種問題,推動大眾形成了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的共識,促使 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的歷史性決定。接着,2013 年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總體規劃、頂層設計和路線圖。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不但確定在經濟領域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還把改革延伸到社會政治領域,把「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樣,就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開闢了嶄新的局面。

中國的經濟改革歷程清楚地表明,每當市場經濟取向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政策的主導思想、更多地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時,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就比較好,非國有經濟部門的創新和創業就會蓬勃發展,也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較為寬鬆的外部環境。無論是改革開放早期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和鄉鎮企業的崛起,還是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財稅、金融和外貿領域的整體改革在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和吸引外資上的明顯成效,以及加

入WTO 後中國經濟通過加速融入全球經濟而獲得的巨大市場和制度紅利,都反覆證明了這一點。與之相反,每當中國經濟政策受到統制經濟思維的干擾時,根植於市場基礎之上的非國有經濟部門往往出現收縮,國有企業改革則陷入停頓,宏觀經濟風險和微觀經濟效益都出現惡化跡象。最典型的例子是 1989 ~ 1992 年因政治風波而出現的反市場經濟思潮,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國家採取強刺激政策所帶來的意外經濟後果。由此可見,要解決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其出路在於堅持和深化以市場化和法治化為導向的全面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訴諸於更多的國家干預。

沿着以上的基本脈絡,本書從中國經濟政策變遷的歷史維度,分專題梳理了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前因後果及其演化路徑,從中也可以看到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兩種不同的模式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長期存在的矛盾和衝突,以及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頓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重大風險。儘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已經寫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但市場經濟取向與回歸統制經濟模式之爭並不會就此消失,中國的改革開放將繼續呈現出巨大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如果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基於市場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將舉步維艱,甚至有半途而廢的風險。

本書的結構如下。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別從中國改革開放前夕 的社會經濟背景和理論知識準備兩方面,討論了中國經濟改革的 必然性和早期路徑選擇上的歷史局限性。第三章到第五章沿着時 間和經濟邏輯順序,分別介紹了從早期「增量改革」模式,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對改革目標的探索,再到 90 年代經濟改革整體推進方針的決策背景以及相關政策對非國有經濟部門乃至整個國民經濟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別聚焦於對外開放和對內消除所有制壁壘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推動力。這些市場化改革的措施,包括加入 WTO ,為中國企業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日益融合的國內外統一市場,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為世紀之交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創造了條件。

然而,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相對低下仍然是一個困擾着決策者的重大問題,表現為國有企業的高槓桿和低效益,以及普遍存在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長模式。第八章到第十章分別從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佈局思路中的統制經濟傾向、因土地和資本等要素市場價格扭曲和地方保護主義而造成的過度投資傾向,以及由此最終合力導致的宏觀經濟脆弱性等方面,揭示了中國經濟中依然存在的體制缺陷和重大風險。第十一章則進一步分析了上述經濟制度的缺陷和扭曲造成中國經濟活動中大量存在的尋租和腐敗行為及其社會後果。腐敗行為的蔓延如果成為社會癌症,其最大的危害在於耗散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所亟需的公眾支持。

本書最後一章着重討論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指出中 共十八大以來的經濟指導思想和重大政策舉措為進一步市場化改 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但各種阻力和障礙依然不可忽視,能 否堅定不移地執行已有改革規劃,是中國能否順利地實現持續穩 定發展的關鍵所在。

目 錄

自 序/1

第1章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後毛澤東時代的開始 / 001

- 1.1 「兩個凡是」, 環是探尋新路? / 002
- 1.2 「睜眼看世界」的啟示 / 010
- 1.3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歷史轉折 / 020
- 1.4 對經濟改革「目標模式」的初步探索 / 030

第2章 初試「市場社會主義」/035

- 2.1 市場社會主義的由來 / 036
- 2.2 市場社會主義的本土資源 / 047
- 2.3 擴大國營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大規模試驗 / 053
- 2.4 市場社會主義對中國改革的後續影響 / 0.59

第3章 增量改革引領民營經濟發展 / 065

- 3.1 個體經營,還是「一大二公」:中國農村面臨的選擇/067
- 3.2 包產到戶的最終勝出 / 074
- 3.3 增量改革使民營經濟破土而出 / 085
- 3.4 增量改革的成就和不足 / 095

第4章 20世紀80年代對全面改革的探索/103

- 4.1 「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 / 104
- 4.2 對市場經濟認識的深化和對總體改革設計的探索 / 108
- 4.3 1986 年:配套改革計劃及其流產 / 113
- 4.4 80 年代末的大辯論、經濟動盪和改革退潮 / 116

第5章 20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的整體推進/129

- 5.1 1989 ~ 1992 年的改革目標大辯論 / 130
- 5.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 / 137
- 5.3 「50條」《決定》的改革總體規劃 / 138
- 5.4 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改革的進展 / 147

第6章 對外開放為改革和發展增添了動力 / 163

- 6.1 從內向型經濟轉向外向型經濟 / 164
- 6.2 80 年代: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171
- 6.3 1994年的外匯改革和出口導向政策的全面實施 / 181
- 6.4 走向全面開放 / 184

第7章 世紀之交:市場力量推動中國經濟崛起 / 191

- 7.1 爭議「基本經濟制度」/ 193
- 7.2 中共十五大的重大決策:「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202
- 7.3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的形成 / 209
- 7.4 令人矚目的成績和未竟之業 / 213

第8章 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經濟佈局調整 / 225

- 8.1 企業承包制:獨具中國特色的國企改革之路/227
- 8.2 現代企業制度的提出與實施 / 238
- 8.3 世紀之交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制浪潮 / 244
- 8.4 國資委建立後的國有經濟改革 / 252

第9章 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步履維艱 / 267

- 9.1 蘇式經濟增長模式的引進 / 268
- 9.2 從經濟結構調整到增長模式轉型 / 278
- 9.3 「十五」期間粗放增長方式的回潮 / 285
- 9.4 增長模式轉型失利帶來的惡果 / 293

第10章 宏觀經濟系統性風險隱現/305

- 10.1 刺激政策、貨幣超發和兩種形態的「通貨膨脹」/307
- 10.2 投資熱潮推動的貨幣超發和信用擴張 / 315
- 10.3 貨幣超發的後果:資產泡沫生成和資產負債表風險積累/322
- 10.4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重新審視和改善宏觀經濟狀況的 艱巨任務 / 334

第 11 章 腐敗行為的蔓延 / 339

- 11.1 90年代鏟除尋租制度基礎的努力 / 341
- 11.2 世紀之初政府管控增強對扼制腐敗的負面影響 / 350
- 11.3 腐敗向其他社會領域的擴散 / 356
- 11.4 貧富差距的拉大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威脅 / 361

第12章 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開闢光明未來 / 367

- 12.1 兩種不同的估計和兩種對立的方針 / 368
- 12.2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大突破 / 374
- 12.3 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克服種種阻力和障礙 / 382
- 12.4 推動全面改革落地生根 / 386

本書作者主要著作 / 391

索 引 / 393

後 記 / 407

第 1 章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 後毛澤東時代的開始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去世。27天以後,中國發生了一起重大的歷史事件:以毛澤東的遺孀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逮捕,結束了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十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改革舊體制和建設新體制的歷史發展時期。^①

從舊體制到新體制轉變的道路不會像北京的長安街那樣筆直,它往往注定了要經歷種種曲折,有時甚至出現向舊體制的短暫倒退,就像馬克思所説的那樣:「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着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着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②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 1976 年 10 月逮捕「四人幫」到 1978 年 12 月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階段的中國社會狀況,形容為「在徘徊中前進」³。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看,這個徘徊摸索的階段,一直延伸到 1978 年 12 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甚至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只是經過曲折反覆的探索,才逐步找到了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

1.1 「兩個凡是」,還是探尋新路?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面對着社會失序和經濟破 數的困境,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國領導人急切希望穩定社會和加速經濟

①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道:「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第11頁。

③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涌過。

發展。為此,他們重申了周恩來總理在「文革」前提出的在 20 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的目標[®],認為「今後 23 年,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工人階級的任務,就是要領導全國人民,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遵循黨的基本路線,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問題在於,提出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固然符合大多數幹部 和民眾的心願,但是華國鋒等當時的領導人沒有認識到中國面臨的社 會危機的深刻程度,也沒有去認真探索阻礙現代中國建設的思想的和 制度的根源,以為排除了「四人幫」的干擾和鞏固了自己的領導權,

① 在 20 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 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是周恩來總理 1964 年 12 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做的《政 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的,但在這個目標提出後不久,就被「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 所代替,中國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之中。

② 見華國鋒 1977 年 5 月 7 日《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華國鋒 1977 年 8 月 12 日《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中重申了以上要求,並把它確定為中共十一大的路線。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文革」期間對毛澤東思想精髓的新概括。 1967 年11月6日,由陳伯達、姚文元起草,毛澤東圈閱同意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 旗》雜誌編輯部文章《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指出:「毛澤東同志全面 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 大理論,並且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這 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誌。」兩報 一刊編輯部文章將這一理論的要點歸結為:「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 級、階級矛盾和階段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 義復辟的危險性」;「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本質上仍然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必須 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 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 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要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 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 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重要的,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篇文 章還認為:「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上述這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天才地 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 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二個偉大的里程碑。」

就能夠繼續沿着毛澤東晚年的治國思路,順利實現「天下大治」的目標。這種想法顯然是脱離實際的。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情況,與以華國鋒為首的新領導班子的政治局限性密切相關。華國鋒等人雖然在葉劍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下一舉粉碎了江青集團而獲得官員和民眾的讚譽,但是他們並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根源在於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極「左」路線,包括「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等等,而只是以為江青等人「陰謀奪取黨和政府的最高權力」造成了「干擾」[®]。對於極「左」路線,他們不但沒有反感,相反還認為必須繼續堅持作為治國的指針。

在毛澤東逝世第二天發佈的《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就已提出:「我們一定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個「三堅持」的基調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還是一直保持着,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極「左」路線,才從黨政文件中消失。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在 1977 年初提出了「抓綱治國」的綱領。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重要社論,正式提出和闡釋「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即「在兩個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得

① 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多次説明了這一點。例如,他在 1977 年 10 月 8 日就逮捕「四人幫」問題給高級幹部「打招呼」的會議上講話時就着重指出:「『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要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賬,他們的核心問題是篡黨謀權。」(參見童青林:《回首 1978:歷史在這裡轉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3 頁。)

更加強大」。與此同時,社論在中央領導人汪東興的指示下,提出了「兩個凡是」的基本原則。它強調:「甚麼時候我們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勝利;甚麼時候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革命就失敗,就受挫折」;因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雖然這種提法受到黨內外的質疑^①,「兩個凡是」還是作為中央的方針得到肯定。

為了執行「抓綱治國」的決策,1977年3月召開了有各省市區 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總結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討論 並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的《關於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 題的彙報提綱》。

在這次會議中,也有一些與當時的主導思想不盡一致的主張。

一種意見要求要對極「左」路線進行政治思想上的清理。例如,當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就指出:「當前總的形勢是好的,但也有困難和不利的因素。最大的不利因素是『四人幫』在政治、思想、組織方面散佈的流毒和影響遠遠沒有肅清。『四人幫』在思想、理論上造成的混亂,必須以極大的努力把它糾正過來。」。這些意見沒有得到採納。雖然在兩報一刊社論中寫上「兩個凡是」的原則並不是華國鋒提出的,但他顯然贊同這一原則,而他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也只對「兩個凡是」的提法作了文字上的改動,叫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擁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

① 例如,時任中央宣傳口總負責人的耿飈在接到要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 軍報》上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社論的工作任務時,就對宣傳口的幾個負責人表示: 刊登這篇文章,就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甚麼 事情也辦不成了。」(轉引自童青林前引書,第29頁;參見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 論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頁。)

② 轉引自黃一兵:《一九十十年中央工作會議研究》,載《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2期。

都必須制止」。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長期形成的國民經濟結構性矛盾經過「文化 大革命」已經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需要先進行調整,穩住陣腳再 前進發展。

這種意見也沒有得到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採納。會議認定「1977年應是走向大治的一年」,決定197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要採取「積極前進」的方針。7月30日中共中央轉發的國務院《關於今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提出,「國民經濟的新的躍進局面正在出現」。[®]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中也確認,「一個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局面正在出現」。[®]

1977年12月,國務院下達了《1976~1985年國民經濟發展十年規劃綱要(修訂草案)》。這個《十年規劃綱要》是由國家計委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制定的《十年規劃綱要》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它要求10年間工農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9.5%,其中農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4.7%,工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11%。

事實證明,當時的領導層對極「左」路線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損害估計過低。華國鋒對於沿着舊軌道前進「實現大治」充滿了信心。所以,1977年7月他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致開幕辭時總結道:「粉碎『四人幫』九個多月來,黨中央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反對和揭批『四人幫』的政治大革命,各條戰線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① 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關於今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1977年7月30日。

② 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1977年8月12日。

③ 華國鋒:《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開幕時的講話》,1977年7月16日。

在「兩個凡是」的問題上,已被中共中央決定其恢復工作但尚 未正式宣佈的鄧小平和當時的主導觀點,包括華國鋒的觀點發生了 分歧。

在華國鋒看來,「中國革命的一切勝利,都應當歸功於毛主席的 理論和實踐活動。毛澤東思想的燦爛光輝,有如偉大的燈塔,衝破了 黑暗,照亮了並將永遠照耀我國革命的長遠的征程。」^①

鄧小平雖然也力求維護毛澤東的威信,但經歷過「大躍進」和「文革」坎坷的他深知民心之所向,也深知如果不改變過去的一些極「左」做法,在「兩個凡是」的指導下將錯就錯地帶病運轉,為中國經濟發展開闢新的前景就將希望渺茫。^②

1977年2月,「兩個凡是」出現不久,鄧小平同前來看望的王震談話,就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提出異議,説「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³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對鄧小平恢復工作作出了明確安排 以後一個月,鄧小平在4月10日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 除了感謝中共中央弄清了自己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之外,鄧小 平在這封信中提出了「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 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命題。[®]他後來說,當時提出這一

① 華國鋒:《在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上的講話》,1977年9月9日。

② 鄧小平激烈地反對在極「左」路線影響下形成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例如,他在 1977 年 12 月 26 日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 (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時就尖銳地指出:「甚麼才叫社會主義優越性。不讀書、不勞動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後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年,第250 頁。)

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第155頁。

④ 同上,第157頁。

命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矛頭正是針對「兩個凡是」。[®]

4月10日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副主任李鑫到鄧小平家中通報中共中央印發鄧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的兩封信的有關情況。在談話中,鄧小平向他們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②

5月24日,鄧小平在與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和黨內重要理論家鄧力群談話時說:「兩個凡是」說不通。他說,「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甚麼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麼完備、準確嘛。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鄧小平說,「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今年四月十日我給中央寫信,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這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

① 鄧小平(1977):《「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8~39頁。

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第157頁。

③ 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 1924年列寧逝世時俄共(布)的領導成員之一,任中央總書記。在清洗其他領導成員之後成為蘇聯共產黨的最高領袖,直到1953年去世。

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

「兩個凡是」意味着要繼續執行造成了巨大災難的極「左」路線 和相關政策。這樣,它就成為終結極「左」路線、尋求發展出路的重 大障礙。

中國共產黨內外許多人認為,當時中央部分領導壓制對極「左」路線反思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希望加以改變。於是在當時仍然兼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的支持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以此為開端,掀起了一場解放思想的大辯論。^②採取「實踐標準」,意味着原來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之類的理論,以及原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以國家計劃號令天下的經濟制度和「對資產階級(包括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面專政」的政治制度都是可以置疑的。這當然是舊路線和舊體制的維護者所不能容忍的。於是一些堅持舊路線的領導人就利用自己在中央機關的權勢,指責提出「實踐標準」是犯了「砍旗」的「方向錯誤」,對主張解放思想的人們進行打擊。

然而親身經歷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人們深切地認識到,回到舊體制和舊路線就意味着苦難的重來。因此,按照「實踐標準」進行反思得到黨內外眾多有識之士的支持,特別是由於得到已經復出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謀長羅瑞卿等一大批老幹部的支持,在黨的領導層的討論中逐漸佔了上風。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也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① 鄧小平 (1977): 《「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4 年第 2 版,第 38 \sim 39 頁。

② 吳汀:《我所經歷的真理標準討論》,《同舟共准》,2001年第9期。

做了自我批評。

「真理標準」討論開啟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大門,而 20 世紀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則為改革開放、振興中華清除了障礙,開闢了道路。

1.2 「睜眼看世界」的啟示

改革開放的新思想不僅像上一節所說,來自對自身歷史經驗的縱 向比較,還來自與其他國家發展歷程的橫向比較。

華國鋒非常重視國外設備、技術和資金的引進,而且極力主張 擴大和加快引進。在引進技術和物質層面的同時還倡導研究國外的經 驗、效仿國外的先進事物。他「主張出去看看,開開眼界」。

1978年5月,華國鋒親自提議派谷牧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6月30日,他在主持聽取谷牧的彙報時指出:「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好經驗值得借鑒。」「不看先進的東西,不比較,就容易驕傲自滿,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讓華國鋒痛心疾首的是:「這不是個別現象、局部現象,是帶普遍性的。這樣能加快速度?」「問題是我們的指導思想落後」,「我們是有個思想束縛,要加快建設,我們本身有個學習問題」,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點」。7月4日華國鋒在同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等領導人談話時再次指出:「現在有個問題,高幹思想跟不上,怎麼辦?多出國,多考察。」。在討論如何實施1979年3月通過的《十年規劃綱要》時提出了了解其他國家的發展情況和尋找新的發展道路的要求。

① 韓綱:《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往事》,第74期,2008年11月14日。

鄧小平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認真思考過去失敗的教訓和注意觀察世界發展動向的領導人。他在1977年12月就說過,「我們的潛力很大,加上認真學習外國經驗,在學習外國東西的基礎上加以創新,大家勁頭都來了。但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還不少。」尋找新路的第一個努力,就是派出大量人員出國學習和出訪歐洲和亞太地區。

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同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了擴大增派留學生的意見。他説,「我贊成增大派留學生的數量,派出去主要學習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7月11日,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關於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的報告》。12月26日,改革開放後的首批留學人員起程赴美國。從1978年到2000年的22年間,中國共有約35萬人出國留學[©]。學成人員中約有70%回國服務。今天中國各方面的不少業務骨幹,都是改革開放以後出國留學學成歸國的。他們為我國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華國鋒、鄧小平等高層推動下,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紛紛組團出國考察,從1977年末開始掀起了一次出國考察熱潮。

從 1977 年底開始,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派出的考察團有幾十個。其中最重要的考察團有: 1977 年 12 月末,由國家經委主任袁寶華和外貿部部長李強率領的國家經委代表團赴英國和法國考察企業管理; 1978 年 3~4 月,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原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林平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考察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

①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第331頁。

② 據國家教育部報告,197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共860人,2001年達到8.4萬人,2013年超過40萬人。

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李一氓為團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喬石為副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以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段雲為組長的國家計委和外貿部考察團,對香港、澳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5~6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的中國經濟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等西歐五國。8~9月,國家經濟委員會組織訪日代表團,考察工業企業管理。各考察團回國後都寫出考察報告,並向中央政治局做彙報。

1978年更是中國領導人出國訪問的高峰,這一年有12位副總理、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1個國家,其中包括華國鋒出訪2次4個國家,鄧小平出訪4次8個國家。

這些參觀訪問對中國的領導幹部造成了很大的衝擊。通過出國考察訪問,長期在封閉環境中生活的領導幹部親眼見到中外之間在經濟發展上的巨大差距。例如,以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考察團報告說: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名工人;法國戴高樂機場,1分鐘起落一架飛機,每小時60架,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一小時起落兩架,還搞得手忙腳亂。代表團成員之一、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多年後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着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你

中國屬於世界落後的那三分之二!」

長期在中共中央從事政策研究和擔任領導人秘書、時任中國社會 科學院副院長的政治家、理論家鄧力群參加國家經濟委員會代表團訪 日歸來,組織編寫了一份長篇的考察報告《訪日歸來的思索》。報告 中寫道:「東京有個百貨公司,按品種、規格來説,經營 50 多萬種商 品。我們王府井百貨公司是22000多種。」「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 產品的極大豐富,就不能實現按需分配。從日本的情況看來,這並不 是可望不可即的。資本主義的日本,產品比我們豐富多了。「我們是 主張消滅三大差別的。但是,消滅三大差別,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力 極大發展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實現。這決不是靠幾條行政命今可以奏 效的。某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儘管是資本主義國家,三大差別, 特別是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實際上是在逐漸縮小的。……人的道德 品質,可以隨着生產力的發展,隨着產品的日益豐富,逐漸變得好起 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自行車不上鎖,拍賣品不收起來,人與人之 間很講禮貌,説明日本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了。……進步的社會制度 和進步思想的教育作用,不能離開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日本人民公共 道德水平的提高,不是靠說教而是靠生產力的發展、生活的改善取 得的。」

出國考察和中外對比造成的衝擊不僅限於經濟發展和經濟管理的 範圍,並且涉及某些過去視為禁區的意識形態觀點和社會制度理念。

例如,鄧力群從日本經濟發展、精神狀態、社會秩序和人民道德 的高水準,城鄉之間、工農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三大

① 以上均見曹普:《1978年高層出國考察引發思想衝擊波》,《學習時報》,2008年12月8日。

② 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吳家駿:《訪日歸來的思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1~20百。

差別」逐步縮小,看到共產主義和按需分配「並不是可望不可及的」, 「我們的事業大有希望」。

鄧力群在《訪日歸來的思索》中提出,日本的確在不少方面有比 我們先進的東西,我們必須把這些先進的東西拿來,使之「變成建設 社會主義的工具」。為此,他專門寫了一節題為「價值規律和計劃性」 的文字,對斯大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價值 規律和有計劃按比例規律互相排斥」等過去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 理的主張提出質疑,主張學習日本的做法,企業、部門和國家的計劃 (「經濟指導計劃」)都要「以價值規律為前提,或者充分適應價值規 律的要求」。從這時開始,直到 1982 年中期後其觀點有所變化,鄧力 群都是主張中國實行商品經濟的重要人物。^①

在領導人出訪外國的記述中,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訪問英國的故事膾炙人口。王震於 1978 年 11 月 6 日至 17 日出訪英國。當時駐英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于日參與了訪問的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一文中記述道:「有人問王震副總理對英國有甚麼觀感,王出人意料地說了這麼一段話:『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②

出國訪問使過去沒有多少機會了解西方世界實際情況的領導幹部開拓了眼界,給他們的思想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他們發現這些年因為耽於靠「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來鞏固

① 還可參見鄧力群(1979):《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1979年3月12日在國家經委企業管理研究班講話)》、《鄧力群文集》第1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189~222頁。

② 于日:《旅英十年 —— 重新認識資本主義》, 載《陳獨秀研究動態》, 2002 年第 3 ~ 4 期, http://www.chenduxiu.net/ReadNews.asp?NewsID=335。

政權和發展經濟,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已經大大落後於 近鄰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日本、新加坡、香港等都抓住了二戰後 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機遇,實現了經濟騰飛。中國必須棄 舊圖新,尋找新的進路。

1978年9月12日,鄧小平在朝鮮同金日成會談時説,「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的落後。甚麼叫現代化?50年代一個樣,60年代不一樣了,70年代就更不一樣了。」[®]在從朝鮮返回北京途中,鄧小平在東北和天津與當地領導人的談話中,反覆講到,中國必須好好向世界先進經驗學習,即改革自己落後的體制。他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總的來說,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築不適應新的要求。」因此,「我們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要有這個雄心壯志。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後,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

鄧小平 10 月下旬在日本考察。他乘坐「新幹線」高速鐵路,參觀了新日鐵鋼鐵公司、日產汽車公司和松下電器公司。11 月 5~14日,鄧小平訪問了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他對二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新加坡等國利用外資發展本國經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次開會,專門聽取訪日代表團、訪港澳代表團和訪問西歐五國代表團的彙報。眾多官員從出國訪問中得到一個清晰的認識:中國已經大大落後於許多國家,沿着老路子走,不可能實現「十年規劃」和「二十三年設想」的要求,因此,

①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第372~373頁。

② 同上,第376、384 頁。

必須對照國外經驗,尋找自己的出路。

在聽取彙報以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一致肯定派團出國考察、 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重大意義。連原來以為只要排除了「四人幫」的 干擾,沿着原來的路線走就能富國安邦、實現天下大治的華國鋒也感 歎道:「我們是坐井觀天,夜郎自大。中國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故鄉, 也是夜郎自大的故鄉。」「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現在 我們的上層建築確實不適應,非改革不可。」^①

為尋找新路來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而採取的第二個重要行動,就是決定在當年7月召開以討論如何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為主題的「國務院務虛會」。

在 6 月 30 日彙報會結束時,華國鋒要谷牧副總理「把出國考察的人員組織起來,共同研究,在國務院務虛會上提出幾條,既務虛又務實。」「7 月份就務起來,一面議,一面定了就辦,看準了就要幹。」²

國務院務虛會從7月6日開始,到9月9日結束,共開了兩個月零4天。會議由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谷牧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參加,參加會議的包括國務院44個部委和直屬機構及其主要負責人。

務虛會開始時,李先念首先講話。他指出,這次會議的方針,是 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充實、補充《十年規劃綱要》,加快實現四 個現代化的速度。

會議上有兩篇超出實務範圍的發言,由於體現了朝野有識之士在 粉碎「四人幫」以後對舊體制、舊路線的反思和對未來經濟體制和發 展大計的設想,對其後改革思路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① 韓鋼:《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續)》,《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

② 同 上。

一篇是由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理論家、政治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和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胡喬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于光遠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後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馬洪共同寫成,由胡喬木代表這兩個中國政府頂級智庫在會議上宣讀的報告《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①

這篇講話最重要的內容是:

第一,批評了「不承認經濟規律,以為社會意志、政府意志、 長官意志就是經濟規律,以為經濟規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變」的 流行觀念,指出為了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特別有必要認真總結建國 三十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努力自覺地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第 二,批評了「認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生產不起調節作用」 的觀點,強調要遵守價值規律:以價值為基礎、商品按等價的原則交 換;而且聲稱,「不遵守客觀存在的價值規律,也就不可能嚴格遵守 有計劃按比例規律」,把原來從社會主義經濟中排除了的價值規律提 高到與社會主義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同等高度。第三,倡 導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認為「只有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發達 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結合起來,把外國經 驗中一切有用的東西和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成功經驗結合起來,我 們才能迅速提高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能力,才能夠加快實現四個

① 作為毛澤東思想主要闡述者之一的胡喬木在這篇講話中接受了許多新的思想。這篇講話的另一位作者于光遠說:這篇文章中,「關於要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辦事,要明確認識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社會的需要,不是為生產而生產這部分是于光遠執筆的。關於規律的客觀性質採用了于光遠一本書中的觀點。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這一部分是馬洪寫的。胡喬木對整篇做了一些斟酌」。(于光遠:《1978 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年,第55 頁。)本文引述的是1978 年10 月 6 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由胡喬木署名的修改稿。

現代化的步伐」。第四,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改革設想。例如,不但在企業之間,而且在國家與企業之間乃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地方各級之間推廣合同制;在明確國家和企業雙方面經濟責任的前提下擴大企業自主權;改變「大而全、小而全的萬能廠」這種工業組織形式,組織全國性的、地方性的、同一行業聯合的、各有關行業聯合的專業化公司;積極恢復和大力加強銀行的作用,通過銀行信貸和撥款對企業活動進行有效的監督;發展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把國家、企業、職工的利益和各種利益關係用法律形式表現出來,並由司法機關按照法律辦法處理。

另外一篇是李先念 1978 年 9 月 9 日所作的總結講話。[©] 講話的主題,是如何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講話的一個重點,是擴大開放。他指出,為了大大加快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為此,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戰略決策,在今後十年把引進的規模擴大到 800 億美元。

更重要的,則是李先念在講話中對於用甚麼樣的體制和政策去 實現「加快經濟發展」目標的討論。和胡喬木的講話一樣,李先念在 講話中着重指出,經濟工作必須嚴格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而不是按 照「長官意志」辦事,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 係、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築。要堅決擺脱墨守行政層次、行 政區劃、行政方式而不講經濟核算、經濟效果、經濟效率、經濟責任

① 這個講話共分 6 個部分:(1)抓緊大好時機,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速度;(2)在統一計劃下發揮中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3)搞好技術引進,努力擴大出口;(4)有關農業的幾個問題;(5)有關工業的幾個問題;(6)搞好領導班子整頓,改進領導作風。其中,「第1個問題是綱,其餘是目,主要解決如何高速度發展經濟的問題。這個講話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經中央常委同意,較系統地提出一些新觀點、新舉措,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奏曲。」(朱玉:《李先念與一九七八年的國務院務虛會》,《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1期。)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先念文選》僅載入其中2、3兩個部分。

的老框框,改變手工業式、小農經濟式甚至封建衙門式的管理方法, 掌握領導和管理現代化工業大生產的本領。

李先念批評過去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往往從行政權力的轉移 着眼,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子中循環。今後要改革計劃體制、財 政體制、物資體制、企業管理體制和內外貿易體制,建立起現代化的 經濟組織,努力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來管理現代化的經濟。

對於甚麼是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李先念的總結講話還在中國的黨 政文獻中第一次用「市場經濟」的概念來界定中國經濟體制的性質, 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引起了熱烈的反響[®]。他在講 話中對這一新提法並沒有做展開的論述,但是把「市場經濟」這一被 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視為資本主義同義語的經濟體制放到共產黨的改 革目標中去,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經濟學界的普遍注目和熱烈討論。雖 然無論是官方和學界後來都沒有接受「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 這樣的表述方式[®],但「市場經濟」在領導人論述中國改革的講話和文

① 曾任陳雲秘書的朱佳木寫道:「李先念在 1978 年 9 月國務院務虛會上作總結講話時說了一句:『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句話雖然在會後印發的文件中沒有寫上,但當時在場的人聽到了,而且記了下來,做了傳達。」「據我分析這個話本身就是由陳雲同志提出,通過李先念同志講出來的。」(朱佳木:《談談陳雲對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的思考》、《黨的文獻》,2000 年第 3 期。)據《陳雲年譜》:李先念 1979 年 2 月 22 日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全國分行行長會議彙報時說,他同陳雲談過,陳雲同意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個大補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 236 頁。)

② 不贊成這一表述的人們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些人只是認為,兩種「經濟」相結合在邏輯上難以貫通,另一些人則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認為把市場經濟列為改革目標是不可接受的。由於後一類人在意識形態領域居領導職位,陳雲等領導人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提法在公開發表時往往被改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陳雲1979年3月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手稿中「市場經濟」的用語在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82年出版)時改為「市場調節」。但在1995年《陳雲文選》再版時又根據作者的意見,重新改回「市場經濟」。(見朱佳木:《談談陳雲對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的思考》,《黨的文獻》,2000年第3期。)

1.3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歷史轉折

1978 年 12 月 18 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它標誌着贊成離開極「左」路線、開闢新道路的力量在執政黨內取得了優勢。

在粉碎「四人幫」和打開國門以後,人們比較中國和別的國家的發展情況,發現事實完全不像多年來的宣傳教育所說,除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國家「風景這邊獨好」外,其他國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許多人都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觸。這種感觸推動了幹部和群眾對舊路線和舊體制反思和對其他國家的經驗學習借鑒。雖然這些活動遭到部分堅持舊路線和舊體制的領導人按照「兩個凡是」原則認定為「反對毛主席指示」、「損害毛主席形象」的「砍旗」行為而受到壓制。但是,歷史潮流是遏止不了的。變革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已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兩種不同的思想路線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並以「凡是派」的失敗告終。

歷時 36 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的議題,一是討論如何進一步 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二是商定 1979 年和 1980 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 院務虛會上的總結講話。

但是在會議的討論中很快突破了這三項議題,把它開成了一次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確定從「以階級鬥爭 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會議,一度附和「凡是派」的中共中 央主席華國鋒也檢討了自己的錯誤。這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給中國的 歷史大轉變揭幕做好了準備。

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①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要解放思想。他説:目前在黨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解放思想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不少人還處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由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很多怪現象就產生了」^②。在這種情況下,「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黨和國家「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因此,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針對過去「離開民主講集中」,「許多人還不是那麼敢講話」的情況,鄧小平着重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採取民主手段,不能採取壓制、打擊的

① 鄧小平(1978):《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0~153頁。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請參閱于光遠:《1978 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②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的怪現象包括:(1)「條條、框框多起來了」。「比如説,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干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堅持中央的領導,變成了『一切統一口徑』」。(2)「隨風倒的現象多起來了」。比如,「不講黨性,不講原則,說話做事看來頭、看風向」。(3)「不從實際出發的本本主義也嚴重起來了」。「書上沒有的,文件上沒有的,領導人沒有講過的,就不敢多説一句話,多做一件事」。

手段。憲法和當章規定的公民權利、當昌權利、當委委員的權利,必 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 尖鋭一點的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 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

鄧小平號召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 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在經濟政策上, 鄧小平主張大膽下放過分集中的管理權力,以便發揮國家、地方、企 業和勞動者四個方面的積極性。與此同時,他提出了「允許一部分地 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 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一「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大 政策」。因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影響和帶動其他地 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 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成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宣佈「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 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終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 綱」^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對黨內外資產階級全面專政」^②

① 毛澤東在1958年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 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 1 他在 1962 年中共八 屆十中全會上進一步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並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 作會議上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口號。這些「最高指示」成為理政治國的總綱領。

② 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階級鬥爭為綱」被進一步提升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 理論」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理論和路線。它們被載入中共九大通過的《中國共 產黨章程》。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的張春橋在他的 重要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紅旗》雜誌 1975 年第4期)中説,無產階級要 解放全人類,就只有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直 到在地球上「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消滅和 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 「使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

等口號,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執政路線的歷史性轉變。雖然極「左」理論和路線的影響仍將長期存在,但從執政黨的決定而言,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R. 科斯(Ronald Coase)所感到的那樣,這意味着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正式劃上了句號。^①

公報直接涉及改革具體措施的文字並不多,甚至完全沒有提及 後來成為改革主要內容的市場取向經濟改革,但是它高度評價了關於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要求全黨「解放思想, 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 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 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這 樣,就解除了思想桎梏,為人們認真反思過去的失誤,探尋振興中華 的正確道路打開了閘門。

在改革初期,鑒於救亡圖存的迫切性,中國領導人在進行改革 理論和政策討論的同時,採取了所謂「摸着石頭過河」^②、「不管黃貓黑

① 科斯、王寧(2011):《變革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5頁。

② 1980年12月16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的重要講話,要求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在這次講話中,陳雲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角度論述了改革開放應採取的方法。他指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着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着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頁。)

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策略:一方面,容許和鼓勵地方政府進行體制和政策的調整,以便給予企業和個人發揮積極性的活動空間;另一方面,也在原有體制和政策的基礎上做出一些變通性的安排,為民間創新創業活動開拓出一定的空間。

重要的變誦性體制和政策安排包括以下各項:

第一,在土地仍歸集體所有的條件下,以「包產到戶」的形式讓農民在從集體「包」(租)來的土地上實行家庭經營。

在 1955 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全國絕大多數農民都在「批判 右傾保守思想」的強制下加入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個體 農民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分得的土地也合併為「不可分割的集體財產」。 1958 年 7 月,毛澤東又號召把高級社合併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 公社,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料都歸「政社合一」的公社統一調 配。這樣,除國家不包工資分配外,「集體經濟」已經與國營企業沒 有太大的區別。

在實現「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後,農民仍然希望重建自己的家庭經濟。於是,一有風吹草動,比如說,遇到了荒年,他們就會在「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名義下提出承包土地、獨立經營的要求。但是毛澤東把「包產到戶」和集體農民擁有的小塊「自留地」、農民出售家庭產品的「自由市場」以及個體工商業戶「自負盈虧」放在一起,

① 鄧小平的「貓論」最早見於 1962 年 7 月他的兩次講話中,一次是 7 月 2 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農業如何恢復問題的講話中講的,另一次是他 7 月 7 日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成員時講的。他在 7 月 7 日的講話中説:「生產關係究竟以甚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黃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怎樣恢復農業生產》、《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23 頁。)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鄧小平繼續採用了這樣的原則。

合稱為「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每一次包產到戶的要求都受到嚴厲的批判和制止。

「文革」結束以後,許多地區的農民再次提出實行包產的要求。 後來通稱為「包產到戶」的包產責任制,當時有「包產到戶」和「包 乾到戶」兩種主要形式。前者與工廠中的計件工資相類似。它的基本 做法是將各田塊的產量指標分配給負責耕作的農戶,在收穫以後,由 集體按各個農戶包產指標的完成情況對它們進行分配。「包乾到戶」 的基本做法是:作為土地所有者的集體(一般由村委會代表)按人口 或按勞動力將土地發包給農戶經營,農戶按承包合同完成國家税收、 統購或合同定購任務,並向生產隊上繳一定數量留存用作公積金和 公益金,餘下的產品全部歸農民所有和支配,從而取消了生產隊統一 經營和統一分配,「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因此,「包乾到戶」雖然還保留着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但在農業經營 方式上已經實現了從集體經營向家庭在承包來的土地上經營的根本 轉變。

除安徽外,四川、貴州、甘肅、內蒙古和河南等地的包產責任制也有了相當規模的發展,並且對促進當地農業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過,上述地區的這種制度變革不被當時實行「兩個凡是」方針的黨中央所認可。直到 1979 年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還規定:「不要包產到戶」和「不許分田單幹」。^①

到了 1980 年 9 月,隨着「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終結和鄧小平 掌握實際領導權,在中共中央批轉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專題座 談會紀要,即《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 中,提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長期『吃返銷糧,生產

① 《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 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 涌渦。

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也可以包產到戶」。這一文件下發後,全國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快速發展,其中發展最快的是「雙包」(「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農村經濟政策的第一個「一號文件」,即《全國農業工作紀要》。這份文件更加明確地指出:「包工、包產、包乾,主要是體現勞動成果分配的不同方法。包乾大多是『包產提留』,取消了工分分配,辦法簡便,群眾歡迎。」這就使以「包乾」為主要形式的承包責任制度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據,從而使這種自下而上的自發制度演變得到了自上而下的確認。

1983 年初,實行以「包乾到戶」為主要形式的「雙包」生產隊 佔全國生產隊總數的 98%。這意味着中國農業在繼續保持土地公有制 的條件下通過「承包」的方式使農民的家庭農場得以建立。

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的推行極大促進了中國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促使中國農業和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1985 年農村總產值較之 1978 年增長了近 3 倍 ^①。1984 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創紀錄的 40731 萬噸,比 1978 年增長 33.6% ^②;隨着農業發展,農村產業結構日趨合理,林、牧、副、漁以及農村工商業產值均有所提升;農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長,1984 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 355 元,比 1980 年增長 85.5% ^③。

第二,在保持公共財政與企業財務合一的條件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使各級地方政府有了促進本地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整個國家成為一個巨大的「企業」,其財

①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第228頁。

② 朱榮等主編:《常代中國的農業》,北京:常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第375頁。

③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1985)。

政體制的特點是公共財政與企業財務合一。在集中計劃經濟下,財政大權集中於中央政府,其組織結構類似於一個全國範圍的單一型(Unitary-Form)企業。在這樣的經濟體系中,地方沒有自己的獨立經濟利益,地方政府也缺乏發展本地經濟的積極性。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了緩解 1979 年出現的巨額預算赤字,調動地方政府增收節支的積極性,從 1980 年起,中央政府將一部分資源配置權力和財政收支決策權力下放給各級地方政府,財政預算體制由中央統收統支制轉向包乾制,即當時被稱為「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除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仍實行接近於「統收統支」的辦法外,其餘省及自治區都實行「分灶吃飯」,即按照預先規定的比例或數額,在中央預算與地方預算之間分配收入的財政管理體制。於是,省、地、縣等地區成為具有自己獨立經濟利益的經濟主體。中國經濟也由一個單一制的企業轉變為多事業部型(Multi-Division Form)企業。[©]在我看來,說它類似於控股型(Holding Form)企業,也許更為貼切。[©]在這種體制下,地方政府獲得了一定範圍的經濟管理權力之後,有動力為本地區進行市場創業活動的人士提供保護和支持,通過擴大本地區的經濟總量來提高地方政府和官員個人的收益。這可以說是「分灶吃飯」改革的一項意外成果。

第三,在物資的計劃調撥和行政定價的「計劃軌」之外,開闢出物資買賣和買賣雙方協商定價的第二軌道:「市場軌」。

在集中計劃經濟下,所有生產性物質資源(生產資料)都由計劃 機關通過行政指令在國有經濟單位之間進行分配,價格只是進行經濟 核算的工具,除佔比重極小的集市貿易市場上有少量「三類物資」流

① 錢穎一、許成鋼、董彥彬:《中國經濟改革為甚麼與眾不同 —— M 型層級制和非國有部門的進入與擴張》、《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3 年第 1 期。

② 结也許正是折年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由來。

轉³ 外,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個體企業和其他非國有經濟成分開始產生和逐漸壯大,它們的生產資料供應沒有列入國家計劃,如果沒有市場交易,這些企業就難以生存,更談不到發展。

1979年,國務院轉發的《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允許國有企業按照不高於計劃價格 20% 的「議價」自銷超計劃產品。與此同時,允許個體企業存在和發展,使生產資料流通和產品定價的「第二軌道」成為必需。價格「雙軌制」使非國有企業能夠通過市場軌來購買生產物資和銷售產品,為它們的存在和發展準備了基本的經營環境。因此,這種制度安排對非國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市場條件。在開始時,對計劃外產品交易價格還有一定的限制,隨着非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在 1984 年佔到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31% 和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在 1984 年佔到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31% 和國有企業計劃外生產和交換範圍的日益擴大,1985 年 1 月國家物價局和國家物資局發出《關於放開工業生產資料超產自銷產品價格的通知》,放開對「計劃外」的產品的限價,生產資料供應和定價的「雙軌制」就正式形成了。對那些在 1983 年以前有權取得計劃內調撥物資的國有企業,仍然根據 1983 年調撥數(即「83 年基數」),按照調撥價供應所需生產資料;超過「83 年基數」的部分,則按照市場價格從市場購買。

第四,在國內市場的「大氣候」尚未形成的情況下,構建對外開 放基地的「小氣候」來與國際市場對接。

① 遵循列寧關於「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1920):《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1頁);以及小商品生產「是一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而且同共產主義進行極殘酷的鬥爭」(列寧(1919):《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同上,第86頁)的教導,對農民的副業生產和商品交換推行了嚴格的限制,甚至完全取消。

早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的 1972 年,中國已經開始改變閉關自守的做法,與西方國家發展貿易關係,學習和引進外國技術和設備。1978 年 12 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

在改革開放初期,要在短時期內形成國內市場並全面與國際市場對接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中國汲取其他國家建立出口加工區和自由港的經驗,利用沿海地區毗鄰港澳台和海外華僑、華人眾多的優勢,通過營造地區性「小氣候」作為對外開放的基地。1980年5月,中國政府決定對廣東和福建兩省實行對外開放的「特殊政策」。1980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區域性外向型經濟形式」的經濟特區。

這些變通性的制度安排,為有創業能力的人從事生產性活動提供 了廣泛的可能性。

改革以前,中國經濟按照列寧的經濟模式,組成一個無所不包的國家大公司,所有的經濟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這種制度條件下,有才能的人士發揮其才能以獲取最大收益(包括財富、權力和聲望)的唯一途徑,就如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所說,乃是「入黨做官」,即成為政府官僚體系(bureaucratic system)的一員;即使要在國營經濟中施展才能,也要首先在上述官僚體系中獲取一定的地位,而很難直接地發揮生產性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改革以前最有才能的人士都能夠進入到對能力回報最高的政府部門。受政治因素和戶籍制度的影響,大量人才無法充分發揮其才能和獲得最大收益。而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採取的一系列變通性制度安排下,隨着政府允許私人創業和從事生產活動所得到報酬的改善,社會成員中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士脱離了原有的職業,轉而成為從事創業活動的企業家。首先,在計劃體制下面臨的不確定性最大、報酬卻最低的農民最具有積

極性開展創業活動;其次,在城市人口中,那些有才能但由於階級成分不好或其他原因不能成為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職工的人群也有積極性從事私人經營;最後,在企業家創新收益不斷提高的條件下,部分體制內的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員工也轉到創業活動中去。

這樣,在作為計劃經濟基礎的國有經濟仍然按照命令經濟的邏輯運轉的情況下,新發育起來的民營經濟成分開拓了由市場導向的活動空間。中國民營企業的數量從無到有,迅速發展起來。到1990年已有私營企業98141戶,個體工商業13283055戶。^①

不過,僅僅在強大的國有經濟之旁開闢出一塊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空間,並不意味着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系統性的改造。就中國經濟整體而言,處在一種「舊的」計劃經濟體系已經被突破,新的市場經濟體系又還沒有建立起來的狀態,經濟增長也很不穩定。

1.4 對經濟改革「目標模式」的初步探索

即使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交也有一批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並不滿足於當時那種零敲碎打的改革,而希望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找到系統解決方案。

為了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對現代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各國改革經 驗進行「補課」。

由於蘇東國家的情況與中國較相近,加上中國的經濟學家對蘇東國家的改革歷程早就有所了解,所以,中國對體制改革總體目標的研究是從了解蘇東的改革理論和實際開始的。1979年末、1980年初和1981年3~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後邀請了當時流亡在外的波蘭經

① 成思危主編:《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年鑒(2007)》,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7年,第748、754頁。

濟學家 W. 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 和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學家 O. 錫克(Ota Sik)[®] 來中國講學,吸引了大批學者和官員聽講[®]。他們兩人對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東歐國家改革情況的介紹,打開了中國學者的眼界。他們所倡導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例如給予國有制企業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市場在國家的掌控下發揮作用,由政府規制下的市場(regulated market)引導企業的經營決策等主張,也為一部分支持市場取向改革的人們所推崇,對中國改革發生了深遠的後續影響。

布魯斯和錫克講學有一個出人意料的副產品,就是他們運用某些 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概念和分析工具來分析經濟問題,使中國經濟學家 耳目一新,產生了更系統地學習現代經濟學的要求,希望從中汲取更 多營養,提高自身求解中國問題的能力。

於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學界掀起了學習所謂「西方經濟學」,即現代經濟學的熱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連續舉辦了三個大型講習班,

① W. 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 1921 ~ 2007),波蘭經濟學家,市場社會主義學派的傳人,曾任波蘭國家計劃委員會研究部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席。他在1961年出版《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一般問題》一書,提出在保持國有制條件下進行經濟改革的「分權模式」(含有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1972年任牛津大學教授,後來加入英國籍。1989年,他與另一位波蘭經濟學家 K. 拉斯基(Kazimierz Laski)合作出版《從馬克思到市場》一書,反思了他在1961年的著作中提出的觀點,認為市場社會主義存在許多無法有效運行的制度缺陷,應當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

② O. 錫克(Ota Sik, 1919~2004),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政治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主張計劃和市場有機結合,走「宏觀計劃、微觀市場」的「第三條道路」。1967年任副總理,領導了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改革。華沙條約國家軍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後流亡瑞士,仍然主張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國內「持不同政見者」「77憲章派」的精神領袖之一。2004年在瑞士病逝。

③ 林重庚:《序二: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五十人看三十年》,中國經濟 出版社,2008年,第2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資料室編:《論社會主義 經濟體制改革:布魯斯和錫克訪華學術報告記錄稿》,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

分別是:「數量經濟學講習班」、「國外經濟學講座」和「發展經濟學講習班」。^①

隨着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對改革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學習考察外國經驗導致的眼界擴大,改革理論的研究已經逐漸超越了 70 年代末期着重討論調動積極性的具體措施的水平,進而研究應當用甚麼樣的經濟體制來取代計劃經濟的舊體制的問題。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對經濟體制改革大致提出了三種可供借鑒的體制模式:

一是「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東歐模式」)。蘇聯和東歐的改革理論和改革實踐對國內經濟學界最先產生廣泛影響。孫治方、蔣一葦等學者主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給予企業更大自主權,這種與1950年代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1960年代蘇聯「利別爾曼建議」大體類似的想法首先在中國得到了應用。這就是70年代末在全國鋪開的「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在這一改革遭遇困難以後,「擴大企業自主權」仍還不斷被作為「搞活企業」的一種措施提出來。于光遠、蘇紹智、劉國光、董輔礽等學者在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歷程做了深入的比較研究後,對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理論和改革實踐做了系統介紹,並在中國改革界掀起了南斯拉夫熱、匈牙利熱等等。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蘇聯東歐改革已經普遍陷入困境,這種模式的影響力大為衰減,但是無論是給予企業經理人更大自主權,還是建立規制下市場的思想,依然在中國經濟改革中有重要影響。

二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二戰結束以後, 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採用威權主義政府和市場經濟相結合

① 吳敬璉:《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2011年7月4日在國際經濟學會(IEA)全球 大會上所做的 Fitoussi 演講,《吳敬璉文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 1530~1547頁。

的辦法,形成帶有重商主義[®]色彩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允許市場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政府運用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和「行政指導」實現對產業發展和企業決策的控制,使整個國民經濟在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的總體框架下運行。這種體制模式對部分中國領導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改革開放初期,大批官員到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考察,並對它們的經濟體制、發展政策和政府作用做了介紹,造成很大的影響。鄧小平 1978 年 11 月訪問新加坡,對他來說,印象最深為深刻的不僅是引進外資、搞開發區,更重要的是在強勢政府管理下嚴整的社會秩序。直到 1992 年的南方談話,鄧小平還沒有忘記誇獎:「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1980 年,經鄧小平同意,由當時主管對外經濟貿易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和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家大來佐武郎於 1980 年共同謀劃發起,於 1981 年成立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每年舉行會議進行交流。

三是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許多理論界人士,特別是經濟學家通常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場上提供私用的商品和服務;過多的政府干預會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並且滋生腐敗。因此,他們更傾向於歐美類型

① 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 16、17世紀盛行於西歐的一種思潮。它力主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強力干預,以便積累貨幣財富,實現富國強兵的國家目標。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國富論》中對重商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② 統制經濟模式起源於 1931 年 4 月日本國會通過的《重要產業統制法》。當時,這種統制是由政府直接進行或通過企業間的卡特爾協議實施的。「二戰」結束以後,日本通商產業省的某些負責人仍想延續這種做法,但因受到自由化潮流的阻擊,後來改為用「政策誘導」的間接方式進行。(參見 C. 約翰遜(1982):《通產省與日本奇跡 ——產業政策的成長》,戴漢笙等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

③ 鄧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379百。

的市場經濟,即自由市場經濟體制。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着 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學者愈來愈多,這種思想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然 而,在當時命令經濟還佔有統治地位而市場的發育程度還很低的條件 下,他們也承認政府需要承擔更多的協調責任,因而與東亞模式的支 持者的分歧並不十分顯著。而相當一部分以自由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最 終目標的人們,也深受 A. 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henkron)[©]等發展 經濟學家的影響,認為在落後經濟向高速發展的衝刺中,強有力的政 府還是利大於弊的。

① A. 格申克龍 (195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 Berthold Hoselizt 主編: *The Progres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2年。他在書中用的「advantages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一詞,常被譯為「後發優勢」。

第 2 章

初試「市場社會主義」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開始了第一次不是針對個別政策,而是 有比較明確體制目標的經濟改革。這場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仿效了蘇聯 和部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 20 世紀 60 年代進行的以增進市場作用 和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而這場改革遵循的經濟模 式,則是源於被稱為「市場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體制設想。

在 20 世紀 20~30 年代西方學術界的「社會主義論戰」中,一些 社會主義的同情者提出,可以用計劃機關模擬市場定價和讓國有企業 之間進行某種程度的競爭的辦法來改善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效率。這 種設想後來就演化為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潮。在 20 世紀 60~80 年代蘇 聯和部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中,市場社會主義作為蘇聯式 社會主義的某種改良,曾經起過重要作用。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後, 蘇聯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思潮和中國本土的同類主張相結合,促 成了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國有企業普遍進行的「擴大自主權」試驗。 不過,隨着這一改革負面效果的顯現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 退潮,「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再也不能成為中國改革的主題曲。

不過即使在那以後,市場社會主義提出的一些改革原則,仍然長時期地在中國改革中發生重要影響。

2.1 市場社會主義的由來

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看來,把市場和社會主義放在一起是 悖理的,因為在獨立的經濟主體之間進行的市場交換,是無法與財富 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社會主義經濟兼容的。馬克思說:「設想一個自 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 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裡,魯濱遜的勞動的 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範圍內重演。